

做一名合格的思想理论传播者

——记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胡宗仁教授

□ 于 湃

使命：一生的承载

法国教育家卢梭曾说：“在所有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这句名言既体现了社会赋予教育事业的神圣荣光，也决定了教育工作者应当具有的教育理想和使命担当。

1997年从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教育原理专业毕业后，胡宗仁有着几次不错的高等院校就职的机会，但他最终决定到江苏省委党校工作。胡宗仁认为，如果说普通教育的使命是为学生的未来生活作准备，那么，政党政治条件下干部教育的本质，就是将一个政党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意图通过教育培训的方式嵌入到干部队伍建设的过程之中，从而最终达成践行党政政治目标、传承政党政治价值观的功能。因此，为打造一支适应长期执政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作准备便成为党校干部教育的全部使命和责任担当，而胡宗仁的教育学学科背景、学科专长恰恰可能为干部教育培训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怀揣着这样的教育梦想，进入行政学教研部工作后，胡宗仁积极寻求学科特长与干部教育的接合点、生长点，将领导学作为教学科研主攻方向，通过厘清领导能力和素质的基本要素，构建了一个领导能力提升的核心框架，并依靠此框架开发和设计教学专题；将干部队伍建设作为主要研究方向，通过对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选人用人制度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维探讨，为科学选人用人提供学理支撑。20年来，胡宗仁一直坚守在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辛勤耕耘于主体班次大讲台，扮演了知识分享者、问题解惑者和思想传播者的角色，教学效果得到学员的广泛认可。同时，他积极参与决策咨询活动，其在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决策咨询成果，直接转化成为省部级层面的干部选拔任用政策文件，对干部选拔任用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起到了具体的、实质性的影响。

科研：在现实土壤中扎根

如同每个人都应有使命感，任何学科亦应有自身的学科使命。在长期



胡宗仁，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江苏省领导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领导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出版专著《现代领导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蓝皮书》《互联网+背景下的政府治理创新》等。

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胡宗仁认为，领导学学科使命主要有三：一是构建完备的领导学学科体系；二是提升领导能力和素质，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三是研究中国化的现实，解决中国化的问题。其中，第三项使命更为根本、更为关键，因为所谓领导能力和素质，应是能够适应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能力素质，所谓高素质干部队伍，应是能够适应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而要承担这一使命，领导学的学科研究首先要直面问题、回应需要、扎根现实。

基于这一假设，多年来，胡宗仁逐渐将学术研究主题和研究视角聚焦于领导干部问题，通过研究中国领导干部活动中的问题，研究现实领导干部活动中的问题，将领导学研究扎根于本土、扎根于现实，逐步形成了一些代表性学术观点。

其一，领导学研究应实现哲学的回归和价值的重塑。他提出，领导干部活动是有规律的，要科学化地把握；领导干部活动是因领导方法和领导风格的不同而变化的，要艺术化地运行，就此而论，领导干部活动是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的综合，4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但是伴随着科学领导能力增强和艺术领导水平提高的同时，个别领导干部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究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在追求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忽略了对领导活动中的意义世界、精神生活和价值诉求的关注，忽视了对领导行为及其过程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解读。因此，当前的领导学研究应该回归哲学层面，注重探讨领导干部活动的哲学意涵、哲学价值。

其二，本土化的领导学应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研究。他提出，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领导学的学科研究主要依靠“蓝色资源”，即西方领导理论和实践资源；依靠“黄色资源”，即中

国传统领导理论和实践资源。这些资源尽管为领导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养料和分析视角，但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之下的中国领导学的研究，如果缺少了“红色资源”，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理论和实践资源的支撑，我们所建构的研究框架是缺乏本土化实践基础的，我们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缺乏现实解释力的。因此，近年来，胡宗仁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表现出浓厚的学术兴趣，并试图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个人领导力和组织领导力研究，为本土化的领导学研究提供新的生长点。

好课：“小火慢炖”

胡宗仁十分重视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注重将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教学专题，通过科研创新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注重将教学问题及时转化为研究课题，通过教学改革不断拓展科研领域。其先后开设了“提升领导者的决策力”“提升领导者的影响力”“卓越组织的领导力”及“建设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等10余个专题。20年来每年都获得主体班教学奖，其中，“提升领导者的影响力”获得全省党校系统精品课。

教师授课的过程实际上是知识分享和思想传播的过程，而要想圆满实现知识分享和思想传播的目标，教师必须精心打磨自己的专题，使其成为精品。胡宗仁常把托尔斯泰的名言挂在嘴边：成功的课都是相似的，不成

功的课各有各的不同。那么，成功的课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他认为：好课是“钻”出来的。一个专题之所以能够成为精品，首先取决于教师能够潜心钻研专题支撑学科的逻辑框架、基本范畴和主要内容，了解该学科的价值系统、理论谱系和知识体系，关注该学科的问题导向、问题意识和问题领域，从而为专题教学提供坚实的学科基础。好课是“悟”出来的。一般而言，教育过程是将前人知识传给后人、将别人经验传给他人，最终实现知识、经验和思想的代际传递与代内共享过程，这就需要教师能够领悟、体悟和感悟书本的、他人的间接经验，对间接经验提炼为规律性认识，进而将所悟所得转化为现实的教學力。好课是“磨”出来的。胡宗仁认为，如果说科学研究是研究者与自己对话、与同行交流，那么教学活动则是教师授业解惑的活动，这就需要教师能够对人类的共同知识、他人的实践经验和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再加工，小火慢炖、精心打磨，从而做到既“用学术讲政治”，又“用艺术讲学术”。多年来，在加强学术支撑的同时，胡宗仁非常注重教学方法和艺术的运用，其逐渐形成的“学术+艺术”的教学风格得到了学员的普遍赞同。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胡宗仁说，奋进的新时代赋予党校教师以新的使命，也给我们提出新的更高的挑战。我们应该怀揣一颗丹心、坚守三尺讲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夯实基础、提升本领，不断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第五届精品课获奖教师作品推介之二

用学术讲政治要立足“学”术

□ 宋铁毅

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何毅亭同志提出“用学术讲政治”的理念以来，“用学术讲政治”已经成为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对党校教师教学能力评价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于党校系统的一名青年教师而言，贯彻“用学术讲政治”的理念，是一个不断砥砺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曾遇到建构体系的瓶颈，也曾遇到围绕观点的困惑。但是，这也使我深刻认识到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学习经历，只有立足学习，才能够解疑释惑，才能够突破难题。

首先，要向集体学“智慧”。青年教师在学术积累、授课方法、理论贯通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一定不足与短板，很难凭借一己之力既精准又全面地将“用学术讲政治”的理念体现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这就需要青年教师能够向前辈们虚心请教，取长补短。在准备课程的过程中，学校为我开通了这一关键渠道，使我能够及时地从学校的前辈、专家那里得到帮助，能够借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进行攻关，解疑释惑，突破难题。

其次，要向学员学“问题”。贯彻“用学术讲政治”的理念，用学术是载体，讲政治是目的。在这里，如何能够既发挥教师的学术优势，又能够避免教师陷入自身的学术盲趣而将政治讲得“抽象”才是关键。在表现形式

上，“用学术讲政治”中一以贯之的学术框架要始终能够与现实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学术对现实的问题关切来展现“政治”的整体性、历史性与必然性，简言之，这就是“问题导向”的关键作用。因此，在建构整个框架体系的过程中，“问题导向”是思考和逻辑的起点。这就需要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必须向学员请教现实的困惑与问题，找准课程的着力点。

再次，要向精品学“经验”。对于青年教师而言，观摩和学习全国党校系统历届精品课、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用学术讲政治”样板课，是迅速提升自身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通过对于精品课，尤其是内蕴在精品课之中的精髓，逻辑思路、授课方式等等的把握和学习，能够使青年教师明确自身的不足和努力的方向。这些宝贵的“经验”是青年教师传承党校授课传统的“必修课”，是青年教师不可多得的财富。

最后，要向经典学“功力”。在“用学术讲政治”过程中，学术既是一种载体，一种逻辑线索，又是“政治”的表现形式。因此，学术的“功力”决定着青年教师对于“政治”的展现程度。只有在自身关注的学术领域中做到精深系统，才能够信手拈来，看得见“政治”与“学术”的内在统一，找准准适合展现“政治”的学术框架。这就需要青年教师必须要具备研读经典、研读原著的能力和



宋铁毅，哲学博士，黑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省级领军人才梯队后备带头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理事。

初劲，把握相关领域学术问题的发展和沿革及其内在的历史和逻辑线索，以学术框架凝练学术传统，以学术传统拓展学术框架，从而通过展现“学术”与“政治”的内在统一，展现“政治”的整体性与历史性，揭示其必然性。

“用学术讲政治”既是顺应新时代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学发展的新理念，是未来教学改革的方向与旨归，同时亦是对党校教师肩负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的必然要求。因此，一方面，从教学工作层面来看，在教学

改革的推进中，“用学术讲政治”已经成为了深入人心的教学理念，以及评价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从教师能力层面来看，却仍然需要经历一段不断深化理解和能力提升的过程。在此意义上，青年教师更应做好“学”术的积累，在不断地学习中打通科研工作与教学工作之间的壁垒，以“讲政治”为引领深化理论研究推动理论创新，以“用学术”为载体坚定政治立场提高政治素养，传承好党校系统“用学术讲政治”优良传统的接力棒。

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猫论」

□ 李海青

邓小平的语言向来以通俗而深刻著称，“猫论”就是典型。关于“猫论”，一般流传的版本是“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并且世人多有实用主义的误解。其实，“猫论”并非邓小平本人首次提出，原话也不是白猫黑猫。邓小平最初谈到“猫论”是引用刘伯承的话。1962年7月7日，邓小平接见出席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谈到了农业生产管理政策的调整问题，他引用刘伯承经常说起的四川谚语：“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由此可见，邓小平完全是在唯物史观特别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视野中来思考问题的，而并非什么实用主义。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建立的生产关系模式实行计划经济，这种经济制度模式对于处于被封锁状态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有其历史的合理性 with 积极作用，但毕竟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当时，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全盘掌控与计划体制使得社会本身缺乏经济的自主权力与创造财富的机会，而社会本身的贫瘠最终严重制约了国家向社会的汲取能力，从而导致这种经济体制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而经济自主权的缺乏与社会本身的贫瘠也使得人民的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这种情况下，改革势在必行。而实践领域的改革首先要求思想领域的解放，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针对理想社会的论述机械地搬到现实中，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与人民的普遍意愿来选择、变化生产关系模式。上引黄猫黑猫的论述实际上表明邓小平并没有教条化地对待生产关系，而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来思考问题。如果教条化地照抄照搬，生产力无法得到持续发展乃至受到破坏，现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够体现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显示它的优越性，它的优越性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然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一定要使人民得到实惠，……从切实经验中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值得爱。”在邓小平的思维中，社会主义不是存在于书本中，不是存在于想象中，不是存在于僵化的制度结构中，而是存在于生产力的实际发展中，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家的不断强盛中。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效一定是可观可感可触的，人民一定是要感到满意的。社会主义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理想国，而是逐步解决现实问题、推进现实发展的现实的运动。

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既然传统制度模式问题严重，那就肯定不能再从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制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了，那么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呢？邓小平通过持续的探索与思考，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几个方面，所强调的都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现实现实功能与实际效果。换言之，要从

现实功能与实际效果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如其不然就是空讲。要按照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与效果来选择与改革生产关系模式，改革政治上层建筑，推动制度的立、改、废。归根结底，制度结构服务于要实现的功能。这样一种现实功能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对传统经济制度论本质观的重大突破与创新。最近在阅读《习近平在正定》一书时，笔者发现当年习近平同志也具有这种功能论思维。书中讲到，1983年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个广招人才的《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加快我县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简称“人才九条”。“人才九条”，文字不长，不过千字，内容却事关各方。利润提成涉及分配制度，人才流动涉及人事体制，细粮供应涉及粮食政策，农转非又涉及户籍管理。特别规定要求：树立新时期用人观点，凡有技术专长的一律接收，包括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过去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可以说，“人才九条”都涉及对既有制度、政策突破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争议很大。书中讲到：“习书记主动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大胆冲破旧有体制条条框框的束缚，积极运用务实政策导向，吸引大批人才、项目在正定落地”，“习书记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心静如水，坦然面对。因为习书记不拘一格博揽群才的目的是富民强县，他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看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是不是对人民有利”。实际上，“人才九条”的制定，正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功能论思维。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是局限在僵化制度层面，畏首畏尾，不敢打破，而是深入到现实功能层面。如果不能解放思想，没有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本质的功能论思维，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

而“猫论”就是这种功能论本质观的形象说法而已。邓小平这种“猫论”思维符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基本观点呢？是完全符合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之所以强调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就是因为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模式下，生产力得不到解放与发展，民众得不到解放与发展，社会无法进步与和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不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他们之所以要建立理想社会就是因为理想社会具有他们所期待的现实功能，能够实现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邓小平“猫论”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深刻地影响了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科学发展观，还是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内涵的中国梦，所要追求与实现的都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应该实现的价值。这种建基于唯物史观之上的“猫论”思维、这种实践性的功能论本质观已经推动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并具有长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必须正确理解并将之有效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实践。